樽酒论文乐无比

——新见吉川幸次郎教授在哈佛之资料

论衡

卞东波

一

日本汉学巨擘、京都大学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在1928—1931年留学中国，在《我的留学记》中，吉川先生详细记载了他在中国的留学生活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后来世事波诡云谲，直到1975年吉川先生才有机会作为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团长访问中国。

吉川先生在中国留学期间，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有人说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似中国人。1931—1975年40多年间，吉川先生虽然没有机会访问中国，但他并没有中断与中国学人的交往，特别是他1953—1954年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到美国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62年，又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在美国从事4个月的研究。滞留美国期间，他与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多有接触，诗章酬赠，蔚为风雅。1953—1954年间，吉川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时，结识了杨联陞、方志彤等学者。在《哈佛遗墨》（修订版，蒋力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中有多首杨联陞先生与吉川先生的酬唱诗，如1954年5月20日，杨先生有《赠吉川》（《哈佛遗墨》，第253页）：

君山先生神不死，薪传今有吉川子。
穷经能译孔壁书，说诗妙解杜陵旨。
全从朴学养新知，前辈风流端可拟。
不远万里来康桥，樽酒论文乐无比。

“君山先生”指的是吉川幸次郎的老师、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1868—1947），他是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狩野直喜为学继承清代的朴学传统，重视考据，这对吉川幸次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杨联陞诗中有“全从朴学养新知”之句。“孔壁书”指的是《尚书》，《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1935—1941年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会读《尚书正义》，并在1939—1945年间，由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出版了《尚书正义定本》，1940—1948年又由岩波书店出版了《尚书正义》的日语译本，所谓“穷经能译孔壁书”盖指此事。“说诗妙解杜陵旨”指的是1950年，吉川先生出版《杜甫私记》之事。

在《哈佛遗墨》中，还有多首杨联陞写给吉川先生的诗，以及吉川先生的和诗，蒋力先生在《君山先生神不死，薪传今有吉川子——杨联陞与日本汉学学人》中（载蒋力《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有详细的叙述。蒋力先生所编的《莲生书简》中收录了杨联陞写给宇都宫清吉、曾我部静雄、神田喜一郎等日本汉学家的信函，却没有写给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信。

2015年，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时，结识了杨联陞先生的弟子陆惠风先生，承陆先生好意，邀请我们到他家里访问。在陆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杨先生的藏书，在某本藏书中竟然夹着一封杨先生写给吉川先生的短笺：

善之教授吾兄史席：

昨日奉到大著《知非集》，拜读一过，真觉琳琅满目，书卷清香，扑人眉宇，诗中所记胜游雅集，令读者恍如身与，儒林文苑，兄兼之矣。诗中步韵之作殊多，自序云：“不求之性情，故作之易。”然声应气求，群性友情，弥复深厚。大舜善与人同，仲尼反而后和，诗歌之道，此亦坦途，千古作者，莫能绝也。弟作打油居多，然颇喜和韵，姑进此解，以博一粲。《知非集》赞三篇，皆佳，桑原“知风作”尤有味。书店广告云“和装帙入”，实与汉装不异，贵国敝国？是耶非邪？专此布谢，即请教安！

弟杨联陞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

《知非集》乃吉川先生所作的汉诗文集，由中央公论社在1960年出版，隔年邮寄给杨联陞先生一部，杨先生在11月2日给其回信。这封信可能后来并未寄出，因为我看到原件和信封俱在，就一直夹在某本书中。信中称赞吉川先生的汉诗“琳琅满目，书卷清香”，又赞吉川先生学术与创作并擅，所谓“儒林文苑，兄兼之矣”。接着又讲了自己对步韵诗的看法，认为步韵、和韵之作可以增进“群性友情”，不可断绝。“大舜善与人同”，用《孟子·公孙丑上》语“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这指出次韵诗中表达的感情，最好“与人同”，配合原作者的思想，从而“因难见巧”。“仲尼反而后和”，用《论语·述而》语“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此语的意思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人有诗赠己，次韵而和之，亦符合“诗可以群”之道。杨先生性喜作诗，从《哈佛遗墨》中所录之诗可见，其中有多首与吉川幸次郎及其他学者的唱和之作。此信则是杨先生谈论对和韵诗看法之作，非常难得。

有趣的是，在另一本藏书中，我还看到了1986年杨先生重录的此信。这封信是用“中研院”史语所的稿纸竖写的，并删去了“《知非集》赞三篇……非邪”一段，但附了一首和诗：

休惊朝市隔人天，勇退由来享大年。
已继前修歌化雨，更因身世叠新篇。
羡君老健犹吞海，愧我痴肥且艺田。
今夕庄周如有梦，不将栩栩换翩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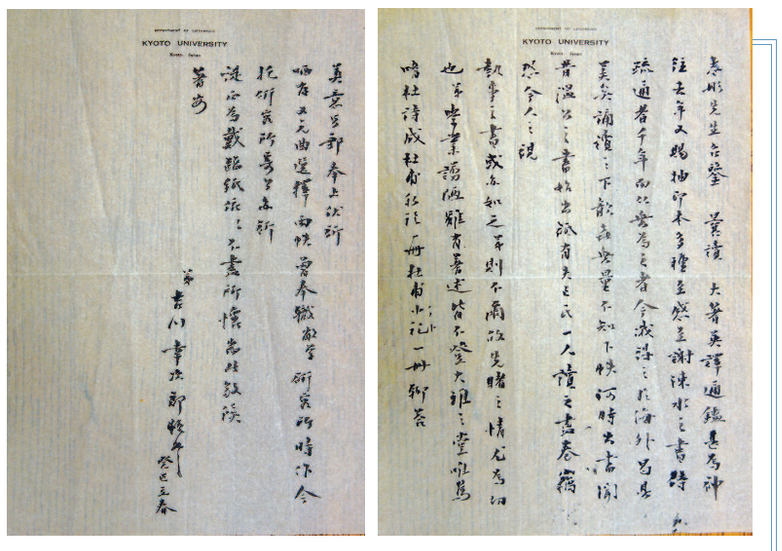
捧读善之居士《归田叠韵》诗，不胜感慨，敬和一首，即祈

郢政

弟杨联陞拜稿
一九八六年三月重录

这首诗亦见于《哈佛遗墨》，题为《和吉川退休诗》，作于1967年8月15日。但《哈佛遗墨》的录本没有“捧读善之居士”云云一段话，可能是1986年重录时加上去的。《和吉川退休诗》也是《哈佛遗墨》中所见的杨先生和吉川先生之间酬唱的最后一首，以后再未见二人有文字交往。

▲吉川幸次郎



▲哈佛大学档案馆方志彤档案中的吉川幸次郎书信

▶杨联陞

文匯學人 第448期

二

1962年，吉川幸次郎先生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再次赴美访问，杨先生有《和吉川诗欢迎其来美讲学》两首（见《哈佛遗墨》，第272页）。第二首首联云：“吾爱吉川子，风流玉树临。”此联用李白《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句法，表示对吉川先生的欢迎。第一首首联则云：“翘迎蓬莱客，欣如龙象临。”“蓬莱”原指海外的神山，这里指日本。“龙象”原为佛教用语，指勇猛能力最大者，这里形容吉川先生在汉学上的造诣。

读《哈佛遗墨》《莲生书简》中所收的杨联陞先生的诗歌和书信，可以看到杨先生与诸多学者，包括日本汉学家之间的密切交往。不意后来有幸能亲眼看到杨先生写给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手迹，仿佛又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现场，聆听两位汉学巨擘的对话。特别是我同时看到了《和吉川退休诗》的手迹和《哈佛遗墨》中的录诗，以及写给吉川先生信的两个版本，发现两者竟有些微差异，这益增加了我对文本在历史中流变的兴趣。

吉川幸次郎在哈佛除了与杨联陞有交往并留下很多文字资料之外，其与哈佛东亚系的高级讲师方志彤亦有交往，但有关文字资料不多。2015年，我在查阅哈佛大学档案馆中所藏的方志彤档案时，偶然发现一封吉川幸次郎先生写给方志彤的信。

志彤先生台鉴：

曩读大著英译《通鉴》，甚为神往，去年又赐抽印本多种，至感至谢！涑水之书，待疏通者千年，而从无为之者，今我得之于海外，曷其美矣！诵读之下，歆喜无量，不知下帙何时出书？闻昔温公之书始出，只有夫己氏一人读之尽卷，窃恐今人之视执事之书，或亦如之。弟则不尔，故先睹之，情尤为切也。弟学业谫陋，虽有著述，皆不登大雅之堂，唯笃杜诗，成《杜甫私记》一册、《杜甫小记》一册，聊答美意，另邮奉上，伏祈哂存。又《元曲选释》两帙，曾奉职敝学研究所时作，今托研究所寄上，亦祈謹正为戴。临纸依依，不尽所怀，尚此敬候

著安

弟吉川幸次郎顿首
癸巳立春

“癸巳”年，即1953年，这一年吉川先生赴美访问。此前披露的史料，只提到吉川与杨联陞等人的交往，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这份资料，清楚地证明了吉川先生与方志彤先生亦有交往。信中提及，“去年又赐抽印本多种”，可见吉川与方志彤的交往可能并不始于吉川访问哈佛之时。“大著英译《通鉴》”指的是方志彤1952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中的三国编年（魏纪）（英译和注释）》（*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265): Chapters 69–78 from the Tzu Chih T'ung Thien of Ssu-ma Kuang*,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Achilles Fang，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系列丛书第六种）。吉川先生自谦“虽有著述，皆不登大雅之堂，唯笃杜诗，成《杜甫私记》一册、《杜甫小记》一册”，“唯笃杜诗”也与杨联陞诗中所云的“说诗妙解杜陵旨”相呼应。

吉川先生一生钟情于杜诗。1967年，他以《杜甫的诗论与诗》作为在京大文学部的最终讲义，并在此年于京大退休。退休后，他组织了会读杜诗的“读杜会”“小读杜会”，与京都地区的学者、京大的学生一起阅读、研讨杜诗。1977年在筑摩书房出版了《杜甫诗注》第1辑《书生之歌》（上），1979年出版第2辑《书生之歌》（下）、第3辑《乱离之歌》。在他去世之后，第4辑《行在所之歌·归省之歌》（1980）、第5辑《侍从职之歌》（1983）才出版。由其弟子兴膳宏先生主持的《杜甫诗注》（第1期全10卷）则由岩波书店在2012—2016年陆续出版。可见吉川先生对杜诗的“笃”嗜，延续了京大两代学人。

1939—1947年，吉川先生在青木正儿教授指导下编纂《元曲辞典》，并一起会读臧懋循的《元曲选》，相关的研究成果就是分别在1951、1976、1977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发行的《元曲选释》。上封信也提到了《元曲选释》，当是1951年出版的第一部。

方志彤彼时在哈佛东亚系只是一名讲师，并无教授职衔，但吉川幸次郎对其颇为尊敬，可见吉川幸次郎知道方志彤是有学问的人。此信在方志彤先生档案中的发现，不但可以补遗皇皇巨编27册《吉川幸次郎全集》之未收，而且揭示了吉川先生在美期间与华人学者交游的一段往事。

三

吉川先生在美国期间与著名史学家何炳棣教授也有交集，他们曾一同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过资料，还在杨联陞先生家里一起畅谈学问。何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段关于吉川先生的记载：

日本传统中国文学第一权威吉川幸次郎在1928—1931年曾在北京留学。1954夏恰巧他和我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日期之内分别在哥大和哈佛图书馆看中文典籍。在纽约时我曾不止一次请他到西119街一家日本面馆，以九毛九分的代价就能吃到一大碗汤鲜牛肉薄嫩的真正圆粗爽滑的udon面。吉川和我都是一支接一支地吸香烟者，餐间餐后总有几十分钟学术和学人掌故的谈话。1954年6月间，他、我、劳榦晚饭后同去杨联陞家以国语畅谈上下古今，非常愉快。按：日本传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要求必须能读大量多样的汉文典籍，不必能讲汉语，而日本研究中国语文和文学的学者必须能以国语（以北京口音为主的中国话）自由谈话。我观察到那天晚上吉川兴致之豪，几乎明示这次四人以国语论学是他近年来难得的精神“享受”。他的国语确实流利，三个多钟头只犯了一个发音的错误：“地痞流氓”的“痞”读成了“否”。（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纪念版]第十章《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3页）

何先生的记载非常生动，既写出了吉川先生与他俱有嗜烟之癖，而且以亲身的观察证明了吉川先生汉语口语之好，不但流利，发音极少错误，而且可以用中文自由畅谈学术。京大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者一直延续着吉川先生的传统，我所认识的京大文学部研究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的学者都在中国留学过，而且中文口语非常流利，可见其渊源有自。何先生描写的吉川先生与何、杨、劳三位华人学者论学的场景不禁让人向往，这也印证了杨联陞先生写给吉川先生诗中所言的“樽酒论文乐无比”。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唐振常先生与《上海史》

于广

近期，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向公众开放了唐振常先生的部分个人资料，共有五大卷，时间范围从1940年至1999年，以“文革”之后的个人资料居多，包括照片、手稿、书信和日记等珍贵内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以收藏近代中国政治人物和有重大影响知识分子的珍贵史料而闻名全球，唐振常先生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位被胡佛研究所收藏资料并建立专档的历史学家。

近代人物和上海史研究，是唐先生治学的两大主要领域。他曾总结一生的学术研究，最喜欢三篇论文：《吴虞研究》《苏报案中一公案——吴稚晖“献策辩”》和《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其中两篇人物研究、一篇上海史研究。唐先生的上海史研究，力主打破对租界的污名化评判，主张客观公正地还原上海历史全貌。他将上海的文化内涵和特点归纳成三点：有容乃大、生意盎然和勇为天下先，并将上海之所以辉煌的原因归结于一个异字，“唯其异，便成就了上海之远东（东亚）大都市；反之，趋同就失去了上海之为上海”。

除了学术观点、内容的创新外，唐先生对上海史研究的贡献，更在于主持编纂了第一部完整的上海通史——《上海史》，培养了一批上海史研究的学者，也因此被誉为“上海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然而，唐振常先生晚年却笑言，“自己与上海史研究不过是一个偶然”。可这样一个偶然，却推动了上海史研究的热潮，使其逐渐成为一门备受关注的“显学”。

《上海史》项目的“偶然”与“必然”

1978年，唐先生的老朋友、时任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长的黎澍在考虑国家史学十年规划的时候，曾征询过唐先生的意见，并希望唐先生能够组织一个班子编写多卷本《上海史》。同年，在全国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议上，提出了由上海社科院承担编写上海史的任务，力争几年内写出一部多卷本的《上海史》。唐先生当时未敢答应，一是唐先生担心不懂上海话能否牵头做好上海史，正如唐先生本人所说“我居上海已五十余年，按说可以叫做上海人了，却至今不能作上海语，不谙上海语而研究上海史，岂不可异。”二是当时唐先生专注于人物史的研究，他在“文革”后的第一篇史学长文《论章太炎》刚刚发表，没想到引起了史坛的大震动，甚至有学者称唐先生为“史学界思想解放的先锋”，趁当时大开风气，唐先生打算专攻蔡元培和其他人物研究。

尽管唐先生当时未敢承诺主持多卷本《上海史》编纂，但他十分清楚上海史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展开一系列上海史研究的铺垫工作。1978年，唐先生牵头在社科院成立了上海史研究室，把上海史研究作为历史所的重点项目。此后，唐先生多次邀请上海专家学者就上海史研究问题进行座谈，并以“上海史编写组”名义出版过四期简报。

1978年，就编纂多卷本《上海史》一事，唐先生组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拟定初步意见，奠定了日后《上海史》编写的基础。该意见将《上海史》的完成时间初步定至1985年，分四卷进行编写，第一卷“鸦片战争前即古代和中世纪的上海”，第二卷“从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上海”，第三卷“从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的上海”，第四卷“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时的上海”。1979年3月，唐先生主持历史所制订1979—1985年科研计划，将上海史研究列为首要项目，并决定组织相关学者搜集资料、编写大事记，开展上海史研究。不过至此时，唐先生仍未有牵头负责编纂多卷本《上海史》的计划，只是计划组织写一部上海通史，或可称作简史。

1979年5月，中国史学会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唐先生随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陆志仁参加。会上，《上海史》项目受到与会者的重视，被正式列入规划。在陆志仁的坚持下，唐先生成为《上海史》项目的负责人，上海史也成为社科院历史所、经济所、文学所、宗教所的共同研究领域。

后来唐先生回忆起接手《上海史》的这段往事时说：“陆志仁很积极，任务落到历史所，又落到我，我不得不上架了。”尽管唐先生自己把《上海史》项目当作一次偶然，但老朋友和同事的信任，加之唐先生对上海史重要性的清晰认识，他与《上海史》的机缘却也是必然。

地方史志工作先行

《上海史》项目的提出，与上海地方史志工作的开展几乎是在同时的，两项工作侧重不同但是互有促进，而负责人实际上都是唐先生。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在会上强调了编写地方史志的重要意义。会议期间，16省市代表专门为此开会讨论编写地方史志问题，倡导成立中国地方史志研究会。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1980年7月29日，上海学术界举行了上海史研究会筹备组会议，会议决定由唐振常（召集人）、陈旭麓、丁日初、吴贵芳、邬烈勋五人组成筹备组，拟定了《上海史研究会章程（草案）》。会后，上海史研究会（筹）挂靠在历史所，唐先生被确定为上海史研究会（筹）的实际负责人。

在唐先生的主持下，上海史研究会（筹）展开了编写《上海史》的前期工作。在1980至1981年，先后举行了三次关于上海史的学术、工作情况交流会议。唐先生早年在新闻、文艺界做过记者和剧本工作，深知传统史学的故纸堆对史志的编写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走访和实地调研。正如唐先生曾经谈过，“上海史包罗万象，不是光凭史学界的力量所能完成，许多业务部门如港务、外贸、银行、海关等与上海史密切有关”。因此，唐先生多次邀请上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会议，包括上海郊县文化、档案方面的同志参加，并广泛地吸收和听取一线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

唐振常

除了广泛听取意见之外，唐先生还注重学习全国其他地区编写地方史志的经验，先后派员参加在天津、太原举行的全国地方史志会议。1980年，唐先生负责出版了内部刊物《上海史研究通讯》两期，增刊两期，除了交流经验、沟通情况外，还为史志研究工作者提供大量资料。今日看来，这部分材料对当下的上海史研究仍是弥足珍贵。

1981年5月5日，酝酿许久的上海史志研究会正式成立，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地方性史志学术研究团体。会议选举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会长为陆志仁，副会长为方行、宋原放、徐尚炯、唐振常与陈旭麓，秘书长为吴贵芳，副秘书长为邬烈勋。彼时，上海还没有市级的地方志编纂领导机构，史志研究会挂靠在社科院历史所，担当着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唐先生实际上主持日常学会的工作，组织、推动全市性的史志研究工作。

史志工作的开展对《上海史》的促进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唐先生后来回忆《上海史》的编纂过程，特意谈道：“更因近年修志，又复人才辈出，是书诸作者能够加入这一行列，更值一贺。”

《上海史》正式出版

一系列的铺垫工作之后，直到1983年，《上海史》项目才正式上马。不过此时，历史所上海史研究室的人员并不多，且研究人员大多对于上海史或全无研究，或研究甚少，鉴于科研力量、资料积累和研究基础等方面的因素，该项目拟定的计划仍是先编写一部《上海简史》，再循序渐进研究一些专题，时机成熟了再编写多卷本《上海史》。

艰巨的任务之下，唐先生领导课题组确立了资料—论文—专著的三级研究层次。课题组先从整理、标点资料入手，出版和翻译了一批重要或罕见的上海史资料，包括“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第一辑十本、《上海近代名人名事名物辞典》等。在资料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对各自承担的部分进行重点研究，写出专题论文，分别集结成《上海史研究》《上海史研究二编》，其中《上海史研究》第一集在日本被评为十大畅销中文书之一。1986年，在专题论文的基础之上，原先计划的《上海简史》初步完成，总字数达到60万。

《上海简史》的先期成果出人意料，课题组备受鼓舞。良好的态势和基础下，唐先生的目标不再是编写一本《上海简史》，而是将“简”字去掉，先完成通史性《上海史》，再编写多卷本《上海史》。

当时，对于许多历史问题的评价，年轻学者不敢轻易下笔。尤其在对租界的评价上，稍有不慎，就会面临诸如“美化租界”的批评。此种环境下，唐先生鼓励撰稿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勇于创新，实事求是，不受老框框束缚”。唐先生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写作之前都与撰稿人具体讨论，拟定提纲，稿成之后，再审订修改，拾遗补阙。

1989年，经过数易其稿，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上海史》正式出版。该书凡85万字，分27章124节，插图82幅，附录6种。1991年，《上海史》被上海社会科学院评定为优秀成果特等奖（1988—1990），又于1994年被上海市评定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1986—1993）。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15卷本、600万字的《上海通史》出版，完成了黎澍先生编写多卷本《上海史》的心愿，《上海通史》也获得了上海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8—1999）著作一等奖、中国国家图书奖。

对于这些奖项，唐先生全然视为身外之物，“得奖与否，得什么奖，并不足以完全论定一部书的学术价值”。甚至1992年访日之时，日本同行称他为“上海史之第一人”，唐先生也只当作笑谈。在上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唐先生不图虚名虚利，坚持不列“上海学”这个名目，而鼓励平稳地进行上海研究，各展所长。他曾对此问题说过：“过早为之定一名目，未必有助于学术的发展，这只是形式问题，还是平平稳稳地去做上海研究为好。”唐先生坚持学术上的独立自由之原则，力图打破门户之见，始终怀着对学术的赤子之心，筚路蓝缕，方能有今日上海史研究蒸蒸日上的气象。

当时《上海史》课题组的年轻成员，如今很多已是知名上海史专家。熊月之先生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唐振常先生这面大旗撑着，是很难推进的。上海史由立项到撰写、出版，唐先生确实起了主心骨作用。”上海史的书写仍在继续，2019年9月，30卷本、1200万字的新修《上海通史》出版了第一批成果，接下来会陆续全部出版。与此同时，更多的年轻学者也在唐先生开辟的这条路上继续前行，推动着上海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